

## 綜合討論

主持人：林鎮國（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林鎮國教授】**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研討會，現在進行最後一場的綜合座談。

我是林鎮國，現任政治大學哲學系及宗教研究所的老師。因為今天研究所有課，所以現在才來到會場，在此致以歉意。非常遺憾失去聆聽上午及下午的精采報告，剛才在閱讀了竹內教授的「日本人的生死觀」後，給我很多啟發。竹內教授的這篇論文，讓我覺得進行生死學的研究原來是非常不幸之事。因為如果根據日本人的傳統，死亡原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非常自然之事。如果引用竹內教授文章中的說法，這都是因為我們這些學者在穿鑿附會，才會開始討論所謂的生死學。這種穿鑿附會，其實早在二十年前就曾發生在我的身上。先在此說明，剛才蔡所長在文章中一開始提到的傅偉勳先生，是九〇年代台灣提倡生死學的重要人物。我是他的博士生，有一年的暑假，幫他去上八〇年代在美國非常流行的「Death and Dying」，結果我去找了一些教材，就是和一、二十歲的學生談海德格、尼采，以及連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內容。剛才閱讀了竹內教授的論文，讓我覺悟到應該獲得救贖與治療的不是生死的問題，而是生死學的問題。以上的內容只是對針對我個人，希望不要影響到今天的討論。

以下開始進行綜合座談，首先請東京大學與政治大學雙方的學者，每一位各利用五分鐘的時間，針對今天的發表內容進行討論及檢討。最後再請竹內教授和蔡所長就雙方團隊目前所進行的計畫做簡單的報告，尋求未來在學術合作上的可能。首先請竹內教授發言。

---

**【竹內整一教授】** 關於進行生死學研究到底是幸還是不幸，首先要釐清的是所謂生死學，並非是死亡學。池澤教授大概亦會對此說明，東京大學進行的生死學研究，並非只限於死亡學，亦有關於生之研究。亦即立足於死亡的事實，考慮生存的意義。對於我們而言，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之後亦無從可知，這是無法牽強附會之事。我對今天會議的感想頗多，誠如剛才林教授所提，生死學之相關研究今後仍應持續。關於今天的生死學台日研討會，都是基於雙方彼此深厚的文化及傳統的生死觀、死亡學所進行之探討，使我受惠良多。令我印象最深刻之事，就是台日雙方對於死亡問題看法之不同。對於死亡或是有關死後之事，台灣各位學者，目前研究的對象是非常的積極或主動，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死亡問題。但在日本，卻並非如此積極，而是先接受死亡再談救濟，以生的觀點來談死亡，二者最明顯的差異，就是日本至今尚未做出改變或解除以上想法之嘗試。此外，關於死亡的態度，台灣人與日本人亦有所差異。日本人認為所有的人死後都會變成佛，成佛之後不會再追究生前的是非，亦不會再追究其生前是好人或壞人。日本有「怨親平等」之說法，怨是怨恨的對象，親是親密的親人或朋友。但是死亡之後，怨恨、怨憎的對象和親人都是平等的。這種對於死亡的態度，會再發展出戰爭責任等敏感的問題。現在並非是討論日本人生死觀的是非或對錯，但首先要認清日本文化的這種特點，自此基礎促進相互之理解，否則就無法解決政治上的敏感問題。

**【金森修教授】** 在早上的會議中已向各位報告，本人是進行歐洲法國的研究，在上午三位日本學者的發表之中，池澤教授是探討中國人的生死問題，而竹內教授是探討關於日本人對於生死的看法，兩位教授都是基於東洋的觀點來探討此事。我還是初學者，對這個部份並非十分熟悉，對此我想以日本人之觀點對生死進行說明。今天下午拜聽了各位教授的發表，其中讓我到非常驚訝的是，做為一個平凡的人，尤其聽到兩位教授發表有關道教的論文，提到非常積極的面對生死問題，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用宏觀且完整的系統去做處理。對於剛才的議論中，還是讓我多少感受到台灣學者與日本學者在想法上之差異，尤其是對於生與死或是死與生，彼此的切入點還是有所不同。在此情況下，當然我們對於生與死的討論，不只是一個學術性、理論上的探討，而是直接切入

到生活或是對現實上的一個對照，從此處看死亡問題。此外，現在歐洲談的不只是生死，而是「生生」的觀念，這個部份也是可以再加繼續探討。因為時間有限，最後再提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日本政府所提出內臟器官移植的新政策，此國家政策現已有所改變，因為現在日本對於生死的態度以及臟器是否可以移植，或是有何規劃性，在生死學上均是重要的議題。臟器移植的法規出現後，現在我們對於把臟器移植給不認識的人，若是自己家人有需要時會優先選擇捐贈給自己的家人，在此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想優先將臟器遺留給自己親屬的想法。若是在有需要臟器移植時，我們可能會出現等待自己家人死亡的這種奇怪狀況，這也有可能成以後生死學將要討論的問題。

**【池澤優教授】** 以下說明有關東京大學生死學的計畫。一般來說我們稱為生死學，但 2002 年時正式稱為「二十一世紀 COE 生死學」。COE 是英文縮寫，這是一個正式的名稱，也有正式課程規劃及培養年輕的研究員。這是一個完整的規劃，因此獲得日本政府經費的補助，目前也是利用此經費從事許多活動。這原本是五年的規劃，五年後再更新定名為「グローバル COE」，代表東亞生死學的區域概念，現在已經邁入第八年，這個計畫加上前五年共是十年，目前還有兩年的計畫會繼續進行。整個 COE 的申請計畫，對生命型態之建構是立基於美國的死亡學基礎，雖然是參考了美國死生學的概念，但我們也知道實際上還存在著某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也曾嘗試要超越，希望用更開放的方式與態度來面對這個問題，同時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架構。具體來說，自此可規劃出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但此部份先暫不談。關於目前所建立的架構，可以從一個三角形的角度來看。三角形有三個頂點，其中一個頂點就是由與死相關的哲學角度出發。第二個頂點是從除了日本之外尚包含著其他國家，各種文化上對於死亡的看法與表現，尤其是歷史上的看法和醫療史上之論述。第三個頂點則是除了理論上的研究之外，對於現實與臨床上的接觸進行探討，例如參訪醫療設施或現場考察，或是對醫療介護人員進行培訓工作，這些都是目前我們所進行的工作。總括我們建構的概念，並非是分很多領域，而是將這些領域的主題意識分散，但最後再將其歸屬於同一根本問題之上，我們在此問題的基礎上做一更具體的生死學構想，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構想。

---

**【林鎮國教授】** 非常感謝池澤教授，最後這個部分也是最讓我們注意關心的問題，讓我們明瞭解到東京大學教育生死學中心對於生死學整體計畫的構想，也讓政治大學宗教所瞭解對於生死學應如何進一步去思考及推動。

**【蔡彥仁所長】** 拜聽三位日本教授的感想與介紹，特別是池澤教授對於東京大學生死學研究中心做了全面性的介紹，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背景，或許今後會有互相合作研究之可能性。生死學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例如精神醫學、安寧護理，特別是對於癌症末期或是自殺、安樂死、墮胎，或剛才所提到的器官移植、幹細胞，在很多的醫療領域，也是自其觀點來進行生死學的研究。今天七位發表者的論文都是自人文的觀點，從哲學、文化、宗教的觀點來探討生死學，透過七篇論文也發現有幾篇論文中，包括了日本及中國，不僅只是對傳統的、現階段的中國大陸及台灣有影響，也不僅是擁有傳統文化的中國影響現階段的台灣，也是在接受相同類似的文化，例如佛教、儒家思想的國家，都觸及到文化層面，也有比較性的理論。我覺得在這一領域，非常值得雙方今後再繼續研究，因為這都是我們的興趣，所以今後能夠再合作與比較。特別是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剛才兩位教授報告的不僅是道教，而且談及道教影響民間信仰在儀式上的實踐，因為本所非常重視田野調查，所以不只是理論面，也非常重視實際的實踐面，或許在此方面可說是台灣學者中，政治大學宗教所比較突出之處。非常高興聽到日本學者報告這些能夠啟發及提醒我們非常具有意義的主題，讓我們受益匪淺。也希望今後能再進一步探討特定的主題，從跨文化、宗教、不同的信仰背景，進行更有意義之探討，這也是我的期待與感想。

**【李豐楙教授】** 我也大致介紹台灣各大學有關生死學的相關活動。

由於傅教授對於生死學的關注，因此後來南華大學成立了生死學研究所，蔡教授大概非常熟悉，這是第一個成立的死生學研究單位。但生死學後來有與殯葬業結合的傾向，殯葬不只是一個龐大的事業體，現在也成為最早在亞洲地區共同討論的項目，包括澳洲特別是中國大陸等，幾乎每年都有進行關於殯葬死亡的研討會與學術討論。第二點是有關學校課程方面，楊國樞教授在台灣大

學開設生死學的講座後，印象中除了政治大學之外，大概台灣的每所大學幾乎都有開過生死學、死亡學這類選修課程。其中最積極的是所謂的醫療學校，從護理學校到醫學院，超過七、八個以上的醫學院與護理學校，都有開過類似課程，因為這是屬於醫療社會學的部份，特別是牽涉到關於臟器移植的部份。除了有醫師專業的課程外，很明顯的必須要結合宗教、哲學等學程共同完成。醫學院的七年級生，也就是即將要擔任醫生的醫學院生，必須接受所謂生死學知識的訓練。醫學院此種教育值得注意的特色，就是從原本翻譯西方的教科書然後逐漸本土化，也就是加入佛教、道教、民俗的觀念等。因此死亡學的認知必須本土化之傾向，是包括台灣大學醫學院都必定要面對的問題。因為醫學院的技術雖然是普世共同，但是一旦面對死亡的時候，是必須面對整個醫療組織背後的文化，也必須要加入人文，特別是宗教信仰的問題。第三種情形是生命教育，由於台灣人自殺年齡有趨於年輕的傾向，特別是中學生，教育部為了因應這種情形，因此開設了生命教育課程。生命教育課程主要主持者，就是輔仁大學的宗教系跟台灣大學的哲學系。第四點是醫學的技術是世界相通，但其背後之文化觀念不同，譬如臟器移植，事實上本來不應該指定臟器要移植給最親近的人，但在台灣由於文化及家庭倫理等等因素，使得醫療單位也不得不開放。但若是器官移植可以優先給自己的親人，這個問題已經不是醫療倫理問題而是人文倫理問題。最後一點是，因為上述原因所以生死學必須學術化，因此我們期望未來有與東京大學的合作機會，或許可以選擇其中一個議題為焦點，再配合其他相關的議題，如此則能有更好的交流，共同進行有關生死學在學術上之研究。

**【林鎮國教授】** 謝謝！剛才雙方的報告，特別是後面的部份非常具有價值，讓我們瞭解到在日本，特別是東京大學生死學計畫的具體作法，以及剛才李老師報告在台灣的相关情形。李老師所提的具體建議，就是朝向未來雙方有更具體合作之內容。

**【徐翔生教授】** 我是政治大學日文系的徐翔生，在此簡單說明今天為何要發表「中日死生觀之差異」論文。我在就讀大學期間因為喜歡文學作品，所以開

---

始閱讀日本的文學作品。我早期所閱讀的文學作品，大概是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及芥川龍之介的作品，後來發現我所閱讀的這些作品的作家都是自殺而死。其後我開始閱讀更爲有名的文學作品，例如夏目漱石的《心》、森鷗外的《阿部一族》，我發現這些作者雖然不是以自殺結束生命，但作品中頻頻出現自殺、殉死、或是對於死亡的一些獨特情感。待我日文較好之後，我開始嘗試閱讀武士道文獻及近松門左衛門的殉情作品，於是我決定赴日留學，在留學期間進行死生觀之相關研究。自留學期間開始到返國後在政治大學任教的二十年間，我一直以文學作品或經典名著來探討其中所見之死亡思想。近年來，我以宗教思想或比較思想、比較宗教學之觀點，來探討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死生觀。因此今天我以日本與中國的殉情作品爲例，藉由作品中所見死亡看法之不同，探討中國人與日本人於死生觀的差異。我覺得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的主題並無太大差異，基本上都是以愛與死爲主題。中國文學作品與日本文學作品相較之下，對於愛的詮釋雖然並無太大差異，可是對於死亡的看法卻有極大不同。今天我也針對以上觀點發表了拙論，如果時間許可再請各位提問指教。

最後我想在此說明自己學習死生觀的心得。誠如中文與日文之表現，在日本是死生觀、死生學，但在台灣卻是生死學、生死觀。今天在座亦有人提及，事實上死生學研究包括了生與死，爲何日本學者進行的研究都是以死亡爲主，而未談及有關生之主題？而我在國內發表論文時，也經常被人提出類似的質疑。我是竹內教授的學生，曾常跟隨竹內教授學習日本思想，另一位指導我進行死生觀研究之學者，是現在東京大學宗教學專攻的島蘭進教授。我也曾向島蘭教授提出這個問題，爲何日本人只是談死而避不談生？島蘭教授曾說：因爲生的範圍非常廣泛，到底要自何談起、從何切入，是極爲困難之事。因此再如何研究「生」，也無法掌握「生」之全貌，但如果自「死」之觀點來探討「生」，對於死生學的研究應能更有幫助。針對今天對此問題有所疑問的來賓，我將個人的學習經驗提出作爲參考分享。謝謝！

**【福間聰（東京大學研究員）】** 蔡教授的報告非常精彩，對我也有很多啓發。我想請教蔡教授，日本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大規模有關生死學問卷調查。但在醫療方面，日本也有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例如有關養老院、臨終關懷等的調

查。在我們研究團隊中，也有一位中川的醫學部教授，現在正針對癌症患者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這種有關醫療的問卷調查，雖然涉及的層面比較特定，範圍也不是很廣泛，但如果台灣也有這方面的問卷調查，或許雙方可以在結果中進行對照，藉此得知台灣人和日本人觀念上的差異。因此我想請問現在在台灣，是否有進行關於醫療方面，例如養老院、臨終關懷等的問卷調查？

**【蔡源林教授】** 在台灣是有進行關於醫療相關部分的調查。

在醫學院內部多少都有進行相關的問卷調查，因為這是醫療社會學裡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癌症末期所謂的安寧照護以及關於安樂死、墮胎、自殺等。這些議題醫學院多少都有在做，但是否是有規模的調查，可能必須與其再進一步聯繫。另外補充福間先生剛才所提的調查是屬於「焦點調查」，而我們現在進行的是「抽樣調查」，一個 random sample。因為在台灣，進行這種調查很困難，必須要從政府的內政部獲得資料，要普遍進行調查會牽涉到保密問題，因為個人的資料不能外洩。所以我們現在進行的調查也會引起一些人較強烈的反應，患者若不願意被調查，政府也不能將資料洩漏給學術機關，因此一般人進行這種調查都有很多顧忌。但焦點調查，是針對老人、癌症患者進行，是比較沒有問題，這一點差異性。但我也同意李教授，在醫學院裡是有進行這種屬於特定病患的調查，這方面是可以得到比較清楚的資料。

**【問題】** 謝謝各位教授，我想問徐教授的問題是，您曾有提及論文中比較的兩部作品，事實上時代背景是有所不同，一個是十八世紀的作品，另一則是三世紀的作品。您剛才亦有提到，三世紀時佛教已經傳入中國，但據我所知，雖然當時佛教已傳入中國，但事實上佛教好像還並未普遍化，而淨土思想也是隋唐之後才開始慢慢被發揚。因此若自此判定中國人不能接受淨土思想的來世思想，是否是太早了一點？

第二個問題是，您剛才在論文中論斷，日本人較受淨土思想影響，所以會對殉情或來世較有美好的想像，而中國人因為受道教與儒家思想影響，比較注重現實，所以不會對殉情或死亡有太多美好之描述。我想瞭解的是，中國人的現實性格在心理學上是被承認的，但這又牽涉到誰是因、誰是果的問題，究竟

---

淨土思想對文化中死亡的想像產生了何種影響？例如日本人對於死亡會美化，是因為其原本的文化特質而後吸收了佛教，還是受到佛教淨土思想影響之後再開始美化死亡？我想知道這中間的因果關係是否不同？而中國也同樣受到淨土思想影響，是不是淨土思想必然會引起對來世的美好想像然後再引發自殺？因為如果就剛才您在作品中大量澄清這是所謂佛教的淨土思想，但正統的佛教思想並不鼓勵自殺，所以若您對於佛教有正確理解，是不會將這兩者作連結。因此我想要詢問的是，究竟這是日本原本的文化，還是因為受到佛教的影響？

**【問題】** 我想問蔡教授關於您調查中對於某些觀念的定義，例如窮人死後會轉世投胎，您想要證明台灣民間一般受到佛教影響頗深。另外，祭拜祖先會受到祖先保佑，是受到儒家孝道倫理思想的薰染，關於這個定義我很清楚。因為就我所知，道教大量吸納佛教思想之後，其本身與民俗信仰同樣帶有投胎轉世的觀念，所以您是如何界定這是佛教思想的影響？因為這不一定是佛教徒，也不一定是吸納了佛教思想的觀念。至於關於儒家孝道的倫理思想，就像剛才另一篇文章提到儒家的現世性格，也就是徐教授所述，他們比較相信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真正的儒家思想，是不會像祖先祭祀這樣，祖先祭祀重於禮，而並非注重在祭祀之後會受到祖先的保佑。而所謂「保佑」的觀念，殷商時代就是所謂的祖先祭祀，相信祖先的魂魄死後還會在身邊，所以會影響後代子孫的禍福。我覺得這與儒家出現的時間點不太一樣，不知您是如何定義這是受到儒家孝道倫理的影響？謝謝您。

**【伊藤由希子（東京大學研究員）】** 今天聽到李教授和謝教授的報告後，我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道教文化中，生者積極的參與或改變死者的狀態，這也是讓我最感驚訝之處。

剛才論文中提到有關對靈魂的鎮壓或鎮魂的儀式與文化，在日本的傳統及歷史上也有鎮魂的現象，例如日本一有名的人物菅原道真，是中世日本的文學家，也是政治人物。他被流放之後日本人建立一個叫做太宰府的宗教設施，用來鎮壓菅原的靈魂。另外蒙古在進攻日本時，日本人將蒙古人稱為元寇，元寇之亂結束以後，日本人將戰亂中死去的蒙古人靈魂進行鎮壓、祭奠。在此過程



中，日本人有一種心態，就是希望死者不要憤怒而得到安寧。日本人其實是害怕死去的靈魂生氣或憤怒，不論是菅原道真或蒙古士兵，對於當地人來說根本沒有親屬關係，是非常疏遠的人，我想問中國是否有對陌生人進行鎮魂的實例或是這種文化傳統？

**【徐翔生教授】** 首先您提到三世紀漢代的作品與十八世紀江戶時代的作品相比，是並不夠客觀。但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中，因為較無殉情作品，這是唯一的一部殉情作品。至於另一部殉情作品《梁山伯與祝英台》這部作品考証的結果可能是虛構故事，而且日本國內《梁山伯與祝英台》只有在國家圖書館中僅存一，市面上完全無法看到，因此難以將《梁山伯與祝英台》拿來進行比較。確實誠如您所指，佛教在漢代已經傳入中國，但中國自漢代開始儒家是正統思想，民間流傳的是道教，因此即使佛教已經傳入，但佛教思想還不是非常盛行。那另外我個人認為中國自六、七世紀的隋唐時代開始，已經變成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狀態，但死生觀念的想法還是受到傳統的儒教與道教的影響。第二點是日本人是何時開始美化死亡？我個人自日本歷代的文學作品來看，其實在日本古代的作品《古事記》中，就是今天竹內教授在論文中所提及之作品，根據古代日本人的想法，人的死後世界是「黃泉」，他們是肯定了死亡這個事實，但卻並沒有美化死亡。我覺得日本人會美化死亡是因為受到佛教影響，特別是在中國的淨土教傳入日本之後。

**【李豐楙教授】** 我簡短的回答問題。在台灣同樣有對陌生或外來亡魂的鎮壓，因為藉由祭祀而較不會有害怕的想法。例如荷蘭人有一些墳墓後來變成祭祀的地方，甚至過去在日本統治期間，有一些日本軍官後來也成為台灣寺廟裡面被祭拜的神。祭拜祂其實也是害怕祂，同時也有安撫鎮定的意義，所以我想這和日本是相同的。另一個問題則是謝謝你指正出來，所謂如何界定儒家、道家跟佛教的關係，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在這次的論文中的確沒有清楚說明，今後在用詞上我會更加注意。謝謝您的提問。

**【林鎮國教授】** 謝謝各位在台上與台下的發言人，這場座談就到此結束。謝

---

謝！

**【竹內整一教授】** 在此再次感謝政治大學的招待，在食住方面也非常感謝徐翔生老師的照顧與幫忙。

**【蔡彥仁所長】**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代表宗教研究所，再次非常感激東京大學的學者與師生，提供我們這個美好的論壇。同時特別感謝發表論文的日本及台灣的學者，也特別感謝徐翔生教授的居間促成。非常感謝各位，期待下次仍能再有這種機會，謝謝！